

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效应

——基于审计定价的证据

王洋洋^{1,2}, 刘佳旋¹, 张蕊^{1,2}

(1. 江西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2. 江西财经大学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从高管团队内部治理角度出发,当非 CEO 高管相对于 CEO 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时,可以对 CEO 的不当行为发挥“自下而上”的制约与平衡作用。基于会计信息外部监督者的视角,通过考察会计师事务所对客户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反应,来揭示企业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非 CEO 高管独立性越高,则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定价越低。机制检验表明,上述结果主要因企业财务报表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下降导致。此外,当非 CEO 高管约束能力更强时,非 CEO 高管独立性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治理效应,进而降低事务所的审计定价;且这一关系在董事会监督效率较低、事务所类型为“非十大”的企业当中尤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非 CEO 高管独立性提高了企业收到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概率;而且即使审计定价降低,审计质量也并未下降。研究结论为明晰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于上市公司优化管理层结构以及事务所进行审计决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非 CEO 高管;公司治理;审计定价;审计风险;治理效果;董事会监督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23)02-0000-00

一、引言

Jensen 和 Meckling 等^[1]提出的代理理论表明由于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管理者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实施机会主义行为,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近年来,因 CEO 自利行为导致企业受损的案例报道屡见不鲜。2020 年,北京燕京啤酒发布公告,CEO 赵晓东由于涉嫌职务违法,被有关部门立案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不能正常履职,最终导致股价大幅下跌;迅雷前 CEO 陈磊涉嫌虚设交易环节侵占公司资产,制造虚假合同套取公司资金,严重损害了公司利益;海航集团因管理者自身的野心和欲望,迫不得已走上破产重组之路,最终 CEO 谭向东于 2021 年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诸如此类 CEO 利用自身权力和信息不对称攫取私利的行为,导致上市公司整体风险水平急剧上涨,并对企业的经营稳定与长远发展产生了强烈冲击。

由于高管团队中的 CEO 和非 CEO 高管^①职业愿景、利益诉求和决策视野存在较大差异^[2],针对 CEO 损害公司利益的不当行为,非 CEO 高管能够对 CEO 发挥“自下而上”的治理效应。具体来说,由于企业的绩效和长远发展与非 CEO 高管自身声誉和职业晋升目标等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当非 CEO 高管发现 CEO 决策是源于私利动机,或者拥有多元化信息来源的非 CEO 高管识别出 CEO 决策存在差错,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时,作为分管各个业务领域的主要负责人,非 CEO 高管很可能通过建言、抵制、反对或不配合等方式进行干预,从而对 CEO 的短视行为和错误决策形成治理效应^[3-4]。然而,这种高管团队内部“自下而上”的监督效应,并非总是存在的,这取决于非 CEO 高管的监督意愿。而非 CEO 高管的监督意愿与其独立性息息相关。基于塑造团体决策程序的互惠规范、偏好和社会一致性准则,针对利益相关者的不当决策,团队成员在履行职权时更倾向选择不作为甚至合谋作为应对策略。因此,独立性是非 CEO 高管有效发挥监督作用、制衡 CEO 自利行为并维护公司整体利益

[收稿日期]2022-12-0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072077);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YC2022-B126);江西财经大学第十七届学生科研课题项目(20220908120738497)

[作者简介]王洋洋(1991—),男,河南淮阳人,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会计发展研究中心讲师,博士,从事审计与公司治理研究,E-mail:wanggy0801@163.com;刘佳旋(1999—),女,河北石家庄人,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审计与公司治理研究;张蕊(1962—),女,浙江建德人,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会计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业绩评价与法务会计研究。

①本文非 CEO 高管指的是企业高管团队中除去 CEO 以外的其他高管人员,具体职位包括副总经理、副总裁、执行副总裁、高级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总会计师、首席运营官、营运总监等。

的前提和基础。当非 CEO 高管相对于 CEO 具有较高的独立性时,非 CEO 高管的监督意愿更强,亦更加敢于对 CEO 的不当决策进行反驳,此时非 CEO 高管对 CEO 的治理效应能够得以充分发挥^[4-5]。综上,较高的非 CEO 高管独立性通过发挥高管团队内部治理效应,能够有效减少 CEO 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降低 CEO 自利举动和错误决策给企业带来的风险,这对于保持企业的平稳经营和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此情形之下,对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外部监督方来说,《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11 号——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中明确要求,注册会计师应当了解控制环境,包括管理层在治理层的监督下,是否营造并保持了诚实守信和合乎道德的文化,以评估客户错报风险。由此看来,企业内部治理状况已然成为审计师风险评估乃至做出审计定价决策的重要考察内容。延续这一分析逻辑,本文从关注并了解企业内部风险状况的外部监督方视角出发,通过考察会计师事务所对于企业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反应,来客观全面地检验非 CEO 高管独立性对 CEO“自下而上”的内部治理效应。

鉴于企业决策一般是由 CEO 和几个担任关键职位的非 CEO 高管组成的小团队商议的结果^[5-6]。因此,本文选取 2007—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样本,基于会计信息外部监督方视角,揭示关键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效应。结果发现:独立性较高的非 CEO 高管通过对 CEO 发挥“自下而上”的治理效应,显著降低了事务所的审计定价,说明非 CEO 高管独立性对审计师具有溢出效应。机制检验表明,非 CEO 高管独立性降低了企业经营波动和盈余操纵的概率,从而使事务所的审计风险下降,审计收费减少。此外,基于事务所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异质性检验还发现,非 CEO 高管独立性与审计定价的负向关系主要体现在“非十大”事务所、非 CEO 高管约束能力较大和董事会监督效率较低的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非 CEO 高管独立性越高,其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小;且即使非 CEO 高管独立性导致审计定价降低,审计质量也并未下降。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丰富了非 CEO 高管独立性治理效应的相关研究。现有研究大多直接考察非 CEO 高管独立性对信息不对称程度、盈余管理行为、资本结构偏离程度等公司层面的影响^[4-5,7]。本文跳出企业内部范畴,以作为会计信息外部监督者的第三方视角,更加客观地检验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内部治理效应。第二,从非 CEO 高管治理视角丰富了审计定价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涉及被审计单位高管层面对审计定价影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整个高管团队和 CEO 个人的影响,对非 CEO 高管及高管团队内部治理的关注有待扩展。本文补充了该领域的相关文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三,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鉴于非 CEO 高管独立性在公司治理方面产生的重要影响,企业自身、投资者、审计机构和监管机构均应予以密切关注。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在聘任非 CEO 高管时,适当约束 CEO 对聘任过程的干涉,有利于改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并降低聘请中介机构的成本。

二、文献综述

(一)非 CEO 高管独立性相关研究

在企业内部管理结构中,高管团队负责整个企业的组织与协调,主管企业的经营管理、战略决策与具体执行^[8]。CEO 作为高管团队的“领头羊”,在企业经营决策的制定和绩效目标的达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高管团队中占比更大的非 CEO 高管也可以通过自身行为影响企业决策。部分学者从高管团队内部视角出发,在非 CEO 高管对 CEO“自下而上”的治理效应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3-5,9]。非 CEO 高管的职业目标往往是通过内部提拔成为下一任 CEO,声誉与职业晋升目标促使非 CEO 高管更加关注企业的长远发展^[5],因此,他们具有强烈的动机抑制 CEO 损害企业长期发展以获得当前利益的行为,并通过消极怠工、拒绝实施 CEO 的命令或者反对 CEO 的决策等方式,对 CEO 的短视行为发挥治理效应^[4]。这种治理效应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股票流动性^[7],减少财务舞弊发生的概率^[5],降低费用粘性^[10],并对企业的风险承担、长期投资增长与研发生产具有促进作用,最终对企业价值产生积极影响^[11]。此外,部分文献指出,在 CEO 任期之前上任的非 CEO 高管比例越高,即非 CEO 高管相对于 CEO 的独立性越强,则非 CEO 高管对 CEO 自利行为的抑制效果越好,高管团队内部治理越有效^[3-4,9]。具体而言,独立性较高的非 CEO 高管通过发挥“自下而上”的治理效应,有利于企业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缓解代理冲突^[4,9],并且对于企业的并购效率和绩效表现具有显著的积极效果^[3]。

(二)审计定价相关研究

随着风险导向审计的推广应用,已有文献普遍认为,成本补偿和风险溢价是影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定价的

两个主要方面,即审计师为应对审计风险,将提高审计投入并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相应审计定价也会上升^[12-14]。一方面,从成本补偿角度出发,现有研究发现,当公司风险越高时,需要的审计证据越多,审计测试的范围越大,相应地审计师需要付出越多的审计成本,导致审计费用上升^[15-17]。另一方面,基于风险溢价视角,部分学者认为,当企业风险较高时,审计师可能会因为审计失败而面临连带诉讼风险、潜在声誉受损、未来业务减少等负面后果,出于“风险补偿机制”的考虑,审计师可能采取较高的审计定价策略以弥补亏损或者转嫁风险^[18-19]。多数文献则同时考虑了成本补偿和风险溢价对事务所审计定价决策的影响,即审计师为应对客户风险,将同时增加审计投入并提高风险溢价水平,进而导致审计收费上升^[13-14]。现有研究证明,有效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可以降低企业风险,审计师感知到的业务风险和审计风险将会减少,审计定价也会相应下降^[20]。具体来说,这些内部治理机制包括大股东、非国有股东以及员工参与治理^[21-23]、内部人举报制度^[24]、高管薪酬激励制度^[25]等。

纵观现有文献,第一,虽然部分学者探究了非 CEO 高管独立性在盈余管理、财务舞弊和绩效表现等单个方面发挥的作用,但鲜有文献客观全面地检验非 CEO 高管独立性对 CEO“自下而上”的内部治理效应。第二,已有文献大多集中于非 CEO 高管独立性对企业内部的影响,但鲜有研究立足外部审计师的视角,考察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溢出效应。第三,以往有关公司治理与审计定价决策的文献已从股东、员工、内部人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对于非 CEO 高管及高管团队内部治理的关注有待扩展。因此,本文将以事务所的审计定价为切入点,探究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效应及其对事务所审计决策的溢出效应,在补充相关理论研究的同时,为审计师风险评估及公司内部治理提供新思路。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委托代理理论表明由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CEO 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实施机会主义行为,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1]。上述行为将导致上市公司整体风险水平急剧上涨,并对企业的经营稳定与长远发展产生强烈冲击。现有研究发现,由于高管团队中的 CEO 和非 CEO 高管职业愿景、利益诉求和决策视野存在较大差异^[2],作为分管各个业务领域的主要负责人,非 CEO 高管能够对 CEO 发挥“自下而上”的治理效应^[4-5,7]。从非 CEO 高管约束 CEO 的动机方面来看,企业的绩效和长远发展与非 CEO 高管自身声誉和职业晋升目标等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因而,当非 CEO 高管发现 CEO 决策是源于自利动机或该决策存在问题时,很可能加强对 CEO 的制约,从而对其短视行为或错误决策形成治理效应^[5],以避免对公司长期利益造成损害。从非 CEO 高管约束 CEO 的能力方面来看,CEO 是公司的战略决策者,而决策的贯彻实施要依赖于非 CEO 高管的密切协作与团结配合。如果非 CEO 高管发现 CEO 的决策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非 CEO 高管可能通过消极怠工、拒绝实施 CEO 的命令、反对 CEO 的决策等方式对 CEO 的行为产生制约^[4]。除此之外,作为企业各个项目的具体实施者,非 CEO 高管还可以利用信息来源多元化的优势建言献策,帮助 CEO 对将要执行的方案进行评估,及时遏止决策失误,降低对公司利益造成损害。

然而,这种高管团队内部“自下而上”的监督效应,并非总是存在,这取决于每一位非 CEO 高管的监督意愿。社会交换理论表明,人们会交换服务、信息、地位等具有社会属性的商品^[26]。CEO 与非 CEO 高管之间由于提名或者聘用而建立联系会促使两者相互交换更多的服务、信息和地位等资源。在此情形下,基于塑造团体决策程序的互惠规范、偏好和社会一致性准则,CEO 与他雇佣的高管之间的联系将促使非 CEO 高管更倾向于服从 CEO 的命令^[27]。因此,只有当非 CEO 高管相对于 CEO 具有较高的独立性时,非 CEO 高管对 CEO 自利行为与错误决策进行监督的意愿才更加强烈,亦更加敢于通过建言、抵制、反对或不配合等方式对 CEO 的不当决策进行干预,此时非 CEO 高管对 CEO 的治理效应才能够得以充分发挥^[3-4]。那么,非 CEO 高管独立性是否能够如上述预期发挥治理效应,进而减少 CEO 自利举动和错误决策对企业带来的风险呢? 本文从关注并熟悉企业内部具体风险状况的外部监督方视角出发,通过考察事务所审计定价决策的变化,来检验非 CEO 高管独立性“自下而上”的内部治理效应是否切实有效。

一方面,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CEO 具有很强的盈余管理动机和行为短期化特征。已有文献指出,CEO 进行盈余管理的两大主要动机为薪酬激励和利益侵占。不管是基于实现分红计划、股权激励等特定合同的盈余目标^[28-30],还是直接与业绩相关的薪酬制度^[31],CEO 均存在较大的动机为了个人收益粉饰盈余。此外,出于侵占公司利益的目的,权力较大的 CEO 可能通过会计政策选择^[32]或构造交易事项,调整企业的盈余信息,以套取公司资金,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无论是出于薪酬激励动机还是利益侵占动机,CEO 都有可能为了个人

收益进行盈余管理,这将导致财务报告的信息失真。在此情形下,为了维护企业长远发展和非 CEO 高管自身利益,独立性较强的非 CEO 高管将通过消极怠工、拒绝实施 CEO 的命令、反对 CEO 的决策等方式^[4-5],有效遏制 CEO 通过“洗大澡”、收益最小化、收益最大化或收益平滑等信息操纵手段来粉饰盈余的行为,降低财务信息在生产使用过程中被故意扭曲的可能,从而提高财务报表质量。此时,作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外部监督者,对于会计师事务所而言非常重要。《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11 号——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应用指南》中明确指出:管理层编制虚假财务报告的动机被认定为可能表明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情况和事项。因此,从事务所角度出发,倘若客户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确有助于对 CEO 编制虚假财务报告的行为形成约束与抑制作用,进而降低财务报表错报风险,那么审计师对重大错报风险的感知也会相应减少,这可能导致审计师预计投入的审计时长和所要求的风险溢价下降,进而做出降低审计定价的决策^[12-14]。

另一方面,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下,CEO 逐渐成为企业最高决策权的拥有者和执行者^[33]。当 CEO 拥有的控制权不断增大时,他们会有更强的欲望来操控企业,做出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行为。具体来说,追求自身利益的 CEO 可能通过增加在职消费来获得隐性报酬^[1],或是借助过度投资以构建其“商业帝国”^[34],抑或是利用盈余操控等手段来影响资本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对自身声誉的评估^[35]。此外,由于过度自信、急于求成或对所投项目缺乏充分了解等原因,CEO 也可能做出过度投资、过度融资等错误决策^[36-37],这将加大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上述 CEO 行为将导致企业经营风险增加,并严重损害了公司的长远利益。由于企业的绩效和长远发展与非 CEO 高管自身声誉和职业晋升目标等个人利益息息相关,针对上述状况,作为分管各个业务领域的主要负责人,独立性较强的非 CEO 高管将通过建言、抵制、反对或不配合等方式^[4-5],对 CEO 增加在职消费等自利行为和过度投资等错误决策发挥治理效应,以减少 CEO 对股东利益造成损失的背离举动,避免非必要的经营业绩波动,进而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01 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明确要求:注册会计师应当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包括被审计单位的目标、战略以及可能导致重大错报风险的相关经营风险。因此,站在事务所的角度来说,如果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确通过发挥治理效应,使企业自身经营风险下降,那么审计师对客户重大错报风险的感知也将相应降低。此时,基于对审计投入和风险溢价的综合考虑,在权衡风险与收益之后,事务所可能会采取较低的报价策略以留住优质客户。

综上所述,倘若企业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确对 CEO 发挥了“自下而上”的内部治理效应,降低了 CEO 进行盈余操纵、利益侵占等不当行为以及决策出现失误的可能性,进而使企业整体风险水平下降,那么,出于对客户风险状况的关注,事务所可能会做出较低的审计定价决策。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

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非 CEO 高管独立性越高,则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定价越低。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7—2020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 ST、*ST、PT 公司;(2)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3)剔除关键数据缺失及异常的公司。经过上述处理后,得到 25324 家公司——年度观测值。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前后 1% 水平的缩尾处理。实证分析所需数据中,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财务重述的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方红星和张勇、李哲等、唐斯圆和李丹^[38-40]的做法,采用当年企业支付的审计费用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来衡量审计费用(*Fee*)。为消除量纲差异,回归时以该比率乘以 1000 作为观测值。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审计费用总额的自然对数进行回归分析,主要结果保持不变。

2. 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非 CEO 高管独立性。由于 CEO 可以干涉非 CEO 高管的选聘过程,所以 CEO 上任后很可能偏好选用与本人使命愿景相似或者价值理念契合的非 CEO 高管与自己合作,被 CEO 提拔或选聘的非 CEO 高管也更倾向于服从 CEO 的决策^[4,27]。但在 CEO 之前上任的非 CEO 高管不存在上述影响,他们对 CEO

的自利行为和错误决策进行监督与约束的意愿更为强烈,具有较高的独立性。故本文参考 Landier 等、张博等^[3-4]的研究,将在 CEO 之前上任的非 CEO 高管比例作为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度量指标,任期早于 CEO 的非 CEO 高管比例越高(低),非 CEO 高管相对于 CEO 的独立性就越强(弱)。鉴于企业决策一般是由 CEO 和几个担任关键职位的非 CEO 高管组成的小团队商议的结果^[5-6],并且企业的绩效和长远发展与关键非 CEO 高管自身声誉和职业晋升目标等个人利益更加息息相关,因此,关键非 CEO 高管的监督能力和监督意愿更强,在验证本文“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效应”方面更加具有代表性。与以往研究一致^[4-6],本文将薪酬排名前 4 位的非 CEO 高管确定为关键非 CEO 高管^①。非 CEO 高管独立性(*Percent*)计算公式如下:

$$Percent = \frac{\text{薪酬总额排名前 4 位的非 CEO 高管中在 CEO 之前上任的人数}}{\text{薪酬总额排名前 4 位的非 CEO 高管人数}^{\textcircled{2}}}$$

3. 控制变量

综合以往文献,本文主要控制了如下变量:企业规模(*Size*)、偿债能力(*Lev*)、盈利能力(*ROE*)、业务复杂程度(*Rinv*)、速动比率(*Quick*)、破产指数(*Z-scor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董事会规模(*Board*)、上市年限(*Age*)、独立董事比例(*Indep*)、事务所类型(*Big10*)、上一期审计意见(*Lopinion*)、会计师事务所变更(*Change*)。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以排除年度差异、行业差异对事务所审计定价的影响。表 1 列示了具体变量定义。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i>Fee</i>	审计费用	(审计费用总额×1000)/资产总额
解释变量	<i>Percent</i>	非 CEO 高管独立性	薪酬总额排名前 4 位的非 CEO 高管中在 CEO 之前上任的人数比率
控制变量	<i>Size</i>	公司规模	公司资产的自然对数
	<i>Lev</i>	资产负债率	期末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
	<i>ROE</i>	盈利能力	公司税后利润与净资产的比值
	<i>Rinv</i>	业务复杂程度	(应收账款净额+存货净额)/营业收入
	<i>Quick</i>	速动比率	(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i>Z-score</i>	破产指数	破产风险指数,计算方法参见 Altman,Zhang and Yen
	<i>Top1</i>	第一大股东持股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i>Board</i>	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总人数的自然对数
	<i>Age</i>	上市年限	公司上市年限
	<i>Indep</i>	独立董事比例	独立董事占全部董事的比重
	<i>Big10</i>	事务所类型	事务所在该年综合评价排名前十,取值为 1,否则取 0
	<i>Lopinion</i>	上一期审计意见	上一期非标准意见取 1,标准意见取 0
	<i>Change</i>	会计师事务所变更	若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当年发生变更,则取值为 1,否则取 0
	<i>Year</i>	年份固定效应	年度哑变量
	<i>Ind</i>	行业固定效应	行业哑变量

(三) 实证模型

为了验证非 CEO 高管独立性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定价的关系,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Fee_{i,t} = \alpha_0 + \alpha_1 Percent_{i,t} + \sum Control + \sum Year + \sum Ind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Fee*为事务所在*t*年对企业*i*的审计定价,*Percent*为企业*i*在*t*年的非 CEO 高管独立性水平, $\sum Control$ 为控制变量, $\sum Year$ 为年度虚拟变量, $\sum Ind$ 为行业虚拟变量。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2 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审计定价与总资产比率(*Fee*)的均值是 0.293,标准差为 0.238,表明审计定价的波动幅度较小。解释变量非 CEO 高管独立性(*Percent*)的均值是 0.405,表明约有 40% 的非 CEO 高管在 CEO 上任前已经在职。其余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现有文献相比均处于合理区间内。

①为了增加可比性,本文剔除了非 CEO 高管人数小于 4 的样本。

②本文的样本中分母一般为 4,但由于存在非 CEO 高管薪酬相同的情况,因此在部分样本中分母也可能为 5。

(二) 基准回归分析

非 CEO 高管独立性与事务所审计定价决策的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列(1)是在没有控制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非 CEO 高管独立性与审计定价的回归结果,列(2)是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回归模型均控制了年度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列(1)结果显示, *Percent* 的回归系数为 -0.029,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初步表明非 CEO 高管独立性通过对 CEO 发挥“自下而上”的治理效应,进而对事务所的审计定价决策产生了溢出作用。列(2)的结果显示,随着模型中控制变量的加入, *Percent* 的回归系数为 -0.009,且依然在 1% 的水平上显著。综上,对于非 CEO 高管独立性较高的客户,在权衡风险与收益后,会计师事务所将做出降低审计定价的决策。该结果表明,非 CEO 高管独立性通过对 CEO 发挥“自下而上”的治理效应,降低了企业经营波动和盈余操纵的概率,从而使事务所的审计风险下降,审计收费减少。因此,本文基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外部监督方视角,客观地验证了非 CEO 高管独立性内部治理效应的存在。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多种方式对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首先,本文研究结论可能会受到自选择问题的影响,即在 CEO 任期之前上任的非 CEO 高管人数占非 CEO 高管总人数的比重不是随机的,该比例会受到 CEO 的影响,这是因为 CEO 上任之后倾向于提拔与自己有相似愿景的非 CEO 高管。为了缓解此影响,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来解决。

其次,为减弱样本自选择问题造成的干扰,本文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阶段中,本文利用“非 CEO 高管独立性是否较高” *MidPercent* (若该公司当年 *Percent* 高于或等于其所在行业所有企业 *Percent* 中位数时,取值为 1,否则取 0) 计算得出 probit 模型的逆米尔斯系数 *IMR*,第二阶段将 *IMR* 放入模型(1)中进行回归。

再次,本文还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排除其他可能的内生性问题。CEO 意外死亡或因健康离职为事先无法预料的意外事件,相对于新任 CEO 来说,非 CEO 高管均在此新 CEO 之前上任,故非 CEO 高管独立性较高。因此,参考张博等^[4]的研究,本文选取 CEO 意外死亡或因健康离职(*IV1*)和非 CEO 高管独立性滞后一期(*IV2*)作为工具变量进行检验。

最后,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1)将企业年度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作为事务所审计定价的替代变量进行回归。(2)由于审计契约签订时间为当年上半年,且非 CEO 高管独立性治理效应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本文将下一年审计定价作为被解释变量,代入主测试重新回归。(3)非 CEO 高管不仅具有相对于 CEO 的独立性,也可能存在相对于董事长的独立性,而后者对企业内部治理也可能产生影响,进而干扰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排除上述影响,本文将非 CEO 高管相对于董事长的独立性(*DPercent*)带入模型重新回归。(4)为了解决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模型中进一步控制公司固定效应。经过上述处理,表 4 结果显示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稳健。

(四) 作用机制分析

较高的非 CEO 高管独立性通过发挥“自下而上”的高管团队内部治理效应,能够有效减少 CEO 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缓解代理冲突问题,降低 CEO 自利举动和错误决策给企业带来的风险,进而影响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定价决策。具体来说,非 CEO 高管对 CEO 自利行为的约束可以产生以下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抑制企业盈余操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N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Fee</i>	25324	0.293	0.230	0.238	0.021	1.291
<i>Percent</i>	25324	0.405	0.250	0.387	0	1
<i>Size</i>	25324	22.22	22.04	1.279	19.92	26.18
<i>Lev</i>	25324	0.444	0.441	0.204	0.057	0.888
<i>ROE</i>	25324	0.063	0.071	0.131	-0.656	0.358
<i>Rinv</i>	25324	0.627	0.426	0.720	0.025	4.641
<i>Quick</i>	25324	1.753	1.112	2.045	0.179	13.35
<i>Z-Score</i>	25324	4.573	2.920	5.242	0.048	33.69
<i>Top1</i>	25324	0.347	0.325	0.149	0.087	0.743
<i>Board</i>	25324	2.300	2.303	0.249	1.386	3.258
<i>Age</i>	25324	17.22	16	7.399	3	32
<i>Indep</i>	25324	0.372	0.333	0.057	0	0.800
<i>Big10</i>	25324	0.604	1	0.489	0	1
<i>Lopinion</i>	25324	0.021	0	0.145	0	1
<i>Change</i>	25324	0.105	0	0.307	0	1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1) <i>Fee</i>	(2) <i>Fee</i>
<i>Percent</i>	-0.029*** (-7.76)	-0.009*** (-3.25)
<i>Controls</i>	No	Yes
<i>Year</i>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N	25324	25324
Adj-R ²	0.085	0.567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下同。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最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Heckman 两阶段	工具变量法		替代变量	下一年审计定价	排除董事长影响	公司固定效应
	Fee	Fee	Fee	Fee	Percent	Fee	Lnfee	FFee	Fee	Fee
Percent	-0.008 ** (-2.32)	-0.009 *** (-3.22)	-0.009 *** (-3.26)	-0.008 *** (-2.83)		-0.010 ** (-2.34)	-0.024 *** (-3.35)	-0.010 *** (-3.13)	-0.009 *** (-3.13)	-0.006 *** (-3.07)
IMR				0.968 *** (9.88)						
IV1					0.102 *** (6.60)					
IV2					0.653 *** (128.87)					
DPercent									-0.005 (-1.5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o
Firm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Yes
N	13878	25304	25315	25324	22924	22924	25324	24499	25040	25324
Adj-R ²	0.562	0.567	0.567	0.570	0.474	0.566	0.660	0.550	0.551	0.442

纵行为,降低信息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被故意扭曲的可能性,即财务报表错报风险减小,进而使得审计风险水平下降;二是抑制 CEO 损害股东权益的背离举动,维护企业业绩和公司价值,避免非必要的经营业绩波动,即非 CEO 高管独立性通过减小企业的经营风险,使得审计师的风险感知水平下降。综上,本文认为非 CEO 高管独立性能够通过缓解代理问题降低企业的财务报表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事务所基于对审计投入和风险溢价的综合考虑,在权衡风险与收益之后,可能会采取较低的报价策略以留住优质客户。为验证非 CEO 高管独立性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机制,本文借鉴温忠麟等^[41]对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构建如下模型先对降低代理成本这一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再进一步对具体的风险机制进行中介效应验证。

$$Mid_{i,t} = \alpha_0 + \alpha_1 Percent_{i,t} + \sum Control + \sum Year + \sum Ind + \varepsilon_{i,t} \quad (2)$$

$$Fee_{i,t} = \alpha_0 + \alpha_1 Percent_{i,t} + \alpha_2 Mid_{i,t} + \sum Control + \sum Year + \sum Ind + \varepsilon_{i,t} \quad (3)$$

以上模型中, *Mid* 代表中介变量,具体包括代理成本 (*AC*)、财务报表错报风险 (*IDA*) 和经营风险 (*ORISK*)。参考褚剑等^[42]的研究,本文采用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和与营业收入之比衡量代理成本。企业的财务报表错报风险使用修正琼斯模型计算的可操控应计盈余的绝对值来衡量,并借鉴李莎等^[43]的做法,使用上市公司过去三年息税前利润的标准差来衡量经营风险。

表 5 列示了非 CEO 高管独立性对审计定价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列(1)、列(3)、列(5)的结果表明,非 CEO 高管独立性 *Percent* 与 *AC*、*IDA*、*ORISK* 显著负相关,即非 CEO 高管独立性降低了企业的代理成本、财务报表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

列(2)、列(4)、列(6)报告了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之后的结果,代理成本、财务报表错报风险、经营风险与审计定价显著正相关。Sobel 检验的结果显示,Z 值分别为 -1.684、-1.685、-1.990,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作用渠道检验成立。上述结果说明非 CEO 高管独立性通过缓解 CEO 的代理问题,抑制了企业的经营波动和盈余操纵行为,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报表错报风险,进而对事务所的审计定价决策产生溢出效应。

表 5 非 CEO 高管独立性对审计定价的作用机制

	代理成本		财务报表错报风险		经营风险	
	AC (1)	Fee (2)	IDA (3)	Fee (4)	ORISK (5)	Fee (6)
Percent	-0.003 * (-1.73)	-0.008 *** (-2.96)	-0.003 ** (-2.33)	-0.009 *** (-3.04)	-0.001 * (-1.94)	-0.008 *** (-2.85)
AC		0.173 *** (14.54)				
DA				0.027 * (1.77)		
ORISK						0.581 *** (14.57)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Sobel:Z		-1.684		-1.685		-1.990
Sobel:P > Z		0.092		0.091		0.046
N	22288	22288	22288	22288	22288	22288
Adj-R ²	0.296	0.571	0.073	0.565	0.210	0.572

(五) 异质性分析

1. 非 CEO 高管约束能力的影响

从非 CEO 高管自身出发,本文探究了非 CEO 高管约束能力对非 CEO 高管独立性治理效应的影响。以往研究发现,非 CEO 高管担任内部董事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44]。这是由于作为企业各个项目的具体实施者,非 CEO 高管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内部信息,在向董事会提供重要信息以及改善董事会的监督职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5]。因此,当非 CEO 高管在董事会有更大的影响力时,非 CEO 高管对 CEO 自利行为的约束能力更强,非 CEO 高管独立性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内部治理效应,进而降低事务所的审计定价。本文根据非 CEO 高管在董事会中任职比例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非 CEO 高管约束能力较小(比例较低)和非 CEO 高管约束能力较大(比例较高)两组。表 6 第(1)和第(2)列报告了非 CEO 高管约束能力的分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 *Percent* 的系数在非 CEO 约束能力较小组并不显著,而非 CEO 约束能力较大组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且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上述结果表明,当非 CEO 高管约束能力更大时,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效应更强,因此对审计定价的抑制效果更好。

2. 董事会监督效率的影响

CEO 由公司董事会任命,并对董事会负责,那么非 CEO 高管对 CEO“自下而上”的治理效应是否受到董事会对 CEO“自上而下”监督效率的影响? 现有研究发现,董事会会议次数是影响董事会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即董事会会议次数越频繁,董事会效率越高^[46-47]。本文根据董事会会议次数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董事会监督效率较低和董事会监督效率较高两组。表 6 第(3)列和第(4)列报告了分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 *Percent* 系数在董事会监督效率较高并不显著,而在董事会监督效率较低组显著为负,且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该结果表明,当董事会监督效率更低时,非 CEO 高管独立性发挥作用的空間更大,对事务所审计定价的降低效果更加明显。即董事会对 CEO“自上而下”的监督作用与非 CEO 高管对 CEO“自下而上”的监督作用具有替代效果。由此看来,当董事会监督效率较低,导致企业在缓解代理冲突、约束 CEO 自利行为方面存在问题之时,企业应重视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效果,以从整体上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3. 事务所类型的影响

从审计定价的另一方出发,本文所研究的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效应还受到会计师事务所的影响。事务所类型是影响审计定价的重要因素,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定价显著高于中小型事务所,而审计的保险价值和审计声誉是决定“大所”和“小所”审计收费差异的根本原因^[48]。本文根据企业所选择的事务所类型,将样本分为“非十大”事务所组和“十大”事务所组。表 6 第(5)列和第(6)列报告了分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十大”事务所组中, *Percent* 的系数不显著,而在“非十大”事务所组中, *Percent* 的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且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上述结果表明,当企业选取的事务所类型为“非十大”时,非 CEO 高管独立性对审计定价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非 CEO 独立性通过约束 CEO 的自利行为,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报表错报风险,对于“非十大”事务所来说,为了留住低风险的客户,更愿降低审计定价。然而对于“十大”事务所来说,虽然客户整体风险水平下降,但由于自身声誉溢价的影响,审计收费并不会减少。

表 6 基于非 CEO 高管约束能力、董事会监督效率、事务所类型的分组回归结果

	非 CEO 高管约束能力		董事会监督效率		事务所类型	
	非 CEO 约束能力较小	非 CEO 约束能力较大	董事会监督效率低	董事会监督效率高	“非十大”	“十大”
	(1)	(2)	(3)	(4)	(5)	(6)
<i>Percent</i>	-0.004 (-1.13)	-0.018*** (-4.10)	-0.017*** (-4.53)	-0.000 (-0.03)	-0.019*** (-4.68)	-0.003 (-0.85)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5368	9956	13758	11566	10022	15302
Adj-R ²	0.571	0.568	0.575	0.559	0.615	0.554
系数差异(P值)		0.005		0.002		0.000

六、进一步分析

(一) 非 CEO 高管独立性与审计意见

审计意见是关键的审计输出结果之一,反映了审计师独立性及其对审计风险的谨慎程度。在以风险为导向为基础的审计模式下,当被审计单位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水平较高时,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意见时会充分考虑自身的审计风险和诉讼风险。具体来说,当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较高时,为应对较高的审计风险,审计师将出具

非标审计意见以减少审计失败的概率。当客户未来出现经营失败的概率较大时,在年报审计过程中,如果审计师对此类客户出具了标准审计意见,将导致自身诉讼风险大幅提升^[49]。因此,对于经营风险水平较高的客户,审计师将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以降低自身的诉讼风险。结合上述分析,较高的非 CEO 高管独立性通过对 CEO 的自利行为发挥治理效应,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报表错报风险。因此,非 CEO 高管独立性较高时,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较低。

为验证上述推论,本文借鉴 Chen 等^[50]的研究将审计意见赋值定序变量(*Type*),如果公司当年被审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Type* 赋值为 0;如果被出具带强调段的无保留意见,*Type* 赋值为 1;如果出具保留意见,*Type* 赋值为 2;如果出具无法表示或否定意见,*Type* 赋值为 3。表 7 第(1)列是非 CEO 高管独立性和审计意见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非 CEO 高管独立性越大,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小。此结果验证了上述分析,即较高的非 CEO 高管独立性使得企业风险水平降低,进而增加了企业收到标准意见的概率。

(二)非 CEO 高管独立性与审计质量

本文进一步考察了非 CEO 高管独立性在降低事务所审计定价的前提下,是否将导致审计师努力下降,审计质量降低,审计失误增多。本文结合我国审计市场环境并借鉴 Palmrose、闫焕民等^[51-52]的研究思路,综合考虑审计意见类型与财务重述两个因素并构建审计失误指标 *AF*, $AF = (1 - MAO) \times FR$,其中,*MAO* 表示非标准审计意见,非标准审计意见取值为 1,标准审计意见取值为 0;*FR* 表示财务重述,年报发生会计差错更正等重述事项取值 1,否则取值 0;那么,当 *AF* 取值 1 时,表示出现审计失误,意味着审计师出具了不够谨慎的审计意见,审计质量较低。将非 CEO 高管独立性与审计失误进行回归,表 7 第(2)列结果显示,*Percent* 的系数不显著为负,表明审计师审计失误并未出现显著变化。此结果表明,即使非 CEO 高管独立性降低了事务所的审计定价,审计师审计失误也并未增多,审计质量并未出现显著变化。

表 7 非 CEO 高管独立性对审计意见和审计质量的回归结果

	(1) 审计意见 <i>Type</i>	(2) 审计质量 <i>AF</i>
<i>Percent</i>	-0.008 * (-1.69)	-0.052 (-0.46)
<i>Controls</i>	Yes	Yes
<i>Year</i>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N	22440	25272
Adj-R ²	0.218	0.067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代理冲突带来的 CEO 自利行为及其治理问题作为企业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不仅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价值创造产生了深远影响,还可能引起外部人关注。本文基于会计信息外部监督者这一新视角,以我国 A 股上市公司 2007—2020 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关键非 CEO 高管独立性对 CEO“自下而上”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独立性较高的非 CEO 高管通过发挥内部治理效应,降低了企业的财务报表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而对事务所的审计定价决策产生溢出作用,使其审计收费减少。当非 CEO 高管约束能力更强时,非 CEO 高管独立性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治理效应,进而降低事务所的审计定价;且这一关系在董事会监督效率较低、事务所类型为“非十大”的企业当中尤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非 CEO 高管独立性提高了企业收到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概率;且即使审计定价下降,审计质量也并未出现明显变化。

结合上述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启示与建议:(1)鉴于独立性较强的非 CEO 高管能够对 CEO 产生“自下而上”的监督作用,因此,上市公司应充分重视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效应;并在聘任非 CEO 高管时,适当约束 CEO 对聘任过程的干涉,有助于优化企业管理层结构,完善内部治理机制。(2)董事会对 CEO“自上而下”的监督作用与非 CEO 高管对 CEO“自下而上”的监督作用具有替代效果,由此看来,企业治理实践中可以巧妙地运用和平衡董事会监督和非 CEO 高管独立性治理之间的潜在替代关系,以从整体上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从而保障差异化情景下企业潜在收益的最大化。(3)在对企业 CEO 因攫取私利而产生的盈余操纵行为保持必要警惕的前提下,审计师也应当关注被审计单位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治理作用,尽可能识别被审计单位真实的情况,更好地判断其可能面临的重大错报和经营风险等,从而优化审计决策,并提供更加高质量的审计服务。(4)鉴于非 CEO 高管相对于 CEO 的独立性对于公司治理产生的重要影响,投资者、债权人、中介机构、监管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均应对企业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效应给予密切关注,以更好地做出相关决策。

本文仍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本文采用在 CEO 之前上任的非 CEO 高管比例作为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度量指标,来考察高管团队内部非 CEO 高管对 CEO 的治理效应,未来研究可以综合高管薪酬和任期等数据探究非 CEO 高管的内部治理效应。其次,限于研究主题,本文只是基于会计师事务所视角,系统剖析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效应,后续研究可考虑从公司内部或其他外部第三方等多角度探讨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效应。最后,本研究主要考察了非 CEO 高管独立性通过缓解 CEO 代理问题来发挥“自下而上”的治理效应。由于不同企业可能具有不同程度的委托代理问题,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差异性的企业代理问题对非 CEO 高管独立性发挥治理效应的权变性影响。

参考文献:

- [1] Jensen M C, 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 3(4): 305 - 360.
- [2] Acharya V V, Stewart C M, Raghuram G R.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of firm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1, 66(3): 689 - 720.
- [3] Landier A, Sauvagnat J, Sraer D, Thesmar D. Bottom-up corporate governance[J]. Review of Finance, 2013, 17(1): 161 - 201.
- [4] 张博, 韩亚东, 李广众. 高管团队内部治理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基于非 CEO 高管独立性的视角[J]. 金融研究, 2021(2): 153 - 170.
- [5] Cheng Q, Lee J, Shevlin T. Internal governance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6, 91(4): 1051 - 1085.
- [6] 张蕊, 王洋洋, 廖佳. 关键下属高管晋升锦标赛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J]. 会计研究, 2020(2): 143 - 153.
- [7] Jain P, Jiang C, Mekhaimer M. Executives' horizon, internal governance and stock market liquidity[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6(40): 1 - 23.
- [8] Beatty R P, Zajac E J. CEO change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large corporations; Succession effects and manager effect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7, 8(4): 305 - 317.
- [9] Khanna V, Kim E H, Lu Y. CEO connectedness and corporate fraud[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5, 70(3): 1203 - 1252.
- [10] 仇萌, 张俊瑞, 王良辉. 非 CEO 高管内部治理对费用粘性的影响[J]. 系统工程学报, 2022, 37(3): 344 - 361.
- [11] Mekhaimer M, Abakah A A, Ibrahim A, et al. Subordinate executives' horizon and firm policies[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22, 74(3): 102 - 220.
- [12] Simunic D A. 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s;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80, 18(1): 161 - 190.
- [13] 伍利娜. 盈余管理对审计费用影响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首次审计费用披露的证据[J]. 会计研究, 2003(12): 39 - 44.
- [14] 邢立全, 陈汉文. 产品市场竞争、竞争地位与审计收费——基于代理成本与经营风险的双重考量[J]. 审计研究, 2013(3): 52 - 60.
- [15] Bell T B, Landsman W R, Shackelford D A. Auditors' perceived business risk and audit fees; Analysis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1, 39(1): 35 - 43.
- [16] Bedard J C, Johnstone K M. Earnings manipulation risk, corporate governance risk, and auditors' planning and pricing decision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4, 79(2): 277 - 304.
- [17] Schelleman C, Knechel W R. Short-term accruals and the pricing and production of audit services[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10, 29(1): 221 - 250.
- [18] 粟立钟, 张润达, 鲁睿. 股权激励与外部审计师风险应对[J]. 审计研究, 2019(3): 120 - 128.
- [19] 李辰, 刘巍, 游家兴. 高管薪酬激励的团队协同与审计费用[J]. 审计研究, 2021(3): 72 - 83.
- [20] 蔡吉甫. 公司治理、审计风险与审计费用关系研究. 审计研究, 2007(3): 65 - 71.
- [21] 朱春艳, 伍利娜, 田利辉. 代理成本、弹性信息披露对审计收费的影响[J]. 会计研究, 2017(7): 89 - 95 + 97.
- [22] 汤泰劫, 吴金妍, 马新啸, 宋献中.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审计收费——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20(1): 68 - 77.
- [23] 宋常, 王丽娟, 王美琪. 员工持股计划与审计收费——基于我国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20(1): 51 - 58 + 67.
- [24] 汶海, 李培功. 内部人举报制度、舞弊风险与审计定价[J]. 审计研究, 2020(3): 86 - 94.
- [25] 张娟, 黄志忠. 高管报酬、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和审计费用——基于盈余管理异质性的视角[J]. 南开管理评论, 2014, 17(3): 74 - 83 + 93.
- [26] FOA E B, FOA U G. Resource theory of social exchange[M]. New York: Springer, 2012: 15 - 32.
- [27] 李小玉, 薛有志, 周杰. CEO 关联、内部治理与企业绩效[J]. 管理科学, 2017, 30(5): 102 - 118.
- [28] Healy P M. The effect of bonus schemes on accounting decision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5, 7(1): 85 - 107
- [29] Cheng Q, Warfield T D. Equity incentiv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5, 80(2): 441 - 476.
- [30] 邵剑兵, 陈永恒. 高管股权激励、盈余管理与审计定价——基于盈余管理异质性的视角[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8(1): 44 - 55.
- [31] 权小锋, 吴世农, 文芳. 管理层权力、私有收益与薪酬操纵[J]. 经济研究, 2010(11): 73 - 87.
- [32] Francis J, Hanna D, Vincent L. Causes and effects of discretionary asset write offs[J]. Journal Research, 1996, 34(supplement): 117 - 134.
- [33] Rosenstein, J. Why don't US boards get more involved in strategy[J]. Long Range Planning, 1987, 20(3): 41 - 57.
- [34] Narayanan M P. Managerial incentives for short-term results[J]. Journal of Finance, 1985, 40(1): 1469 - 1484.
- [35] Francis J, Huang A H, Rajgopal S, Zang A Y. CEO reputation and earnings quality[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8, 25(1): 109 - 147.
- [36] Malmendier U, Tate G. CEO overconfidence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5, 60(6): 2261 - 2270.

- [37] 余明桂, 夏新平, 邹振松.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激进负债行为[J]. 管理世界, 2006(8): 104 - 112 + 125 + 172.
- [38] 方红星, 张勇. 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盈余管理与审计师决策[J]. 会计研究, 2016(1): 79 - 86 + 96.
- [39] 李哲, 黄静, 孙健. 企业创新新颖度与审计收费——基于上市公司专利分类数据的证据[J]. 会计研究, 2020(8): 178 - 192.
- [40] 唐斯圆, 李丹. 上市公司供应链地理距离与审计费用[J]. 审计研究, 2019(1): 72 - 80.
- [41] 温忠麟.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5): 614 - 620.
- [42] 褚剑, 秦璇, 方军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审计决策——基于审计收费的证据[J]. 会计研究, 2018(12): 85 - 91.
- [43] 李莎, 林东杰, 王彦超. 公司战略变化与审计收费——基于年报文本相似度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19(6): 105 - 112.
- [44] 袁建国, 范文林, 程晨, 肖华芳. CFO兼任董事能促进公司提高投资效率吗?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管理评论, 2017(3): 62 - 73.
- [45] Harris M, Raviv A. A theory of board control and size[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8, 21(4): 1797 - 1832.
- [46] Nikos V. Board meeting frequency and firm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9, 53(1): 113 - 123.
- [47] 刘玉敏. 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效率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06(1): 84 - 90.
- [48] 漆江娜, 陈慧霖, 张阳. 事务所规模? 品牌? 价格与审计质量——国际四大中国审计市场收费与质量研究[J]. 审计研究, 2004(3): 59 - 65.
- [49] 朱小平, 叶友. “审计风险”概念体系的比较与辨析[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3(5): 11 - 15.
- [50] Chen S, Sun S, Wu D. Client importance,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 and audit quality in China: An office and individual auditor level analysi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0, 85(1): 127 - 158.
- [51] Palmrose Z. An analysis of auditor litigation and audit service quality[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88, 63(1): 55 - 73.
- [52] 闫焕民, 王浩宇, 张文. 审计师任期交错与审计意见决策——基于项目团队与业务团队的双维视角[J]. 审计研究, 2019(5): 112 - 119.

[责任编辑: 杨志辉]

Governance Effects of Non-CEO Executive Independence: Evidence Based on Audit Pricing

WANG Yangyang^{1, 2}, LIU Jiakuan¹, ZHANG Rui^{1, 2}

(1. School of Accounting, 2. Center for Accounting Studie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governance of the executive team, when non-CEO executives have stronger independence from the CEO, they can play a “bottom-up” role in checking and balancing the misconduct of the CEO.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n external monitor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governance effects of non-CEO executive independence by examining accounting firms’ responses to the independence of non-CEO executives of their clients. It is found that higher non-CEO executive independence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audit pricing by accounting firms. Mechanistic tests indicate that the above results are mainly due to a decrease in the risk of misstatement of corporate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operational risk. In addition, when non-CEO executives have greater discipline, non-CEO executive independence has a more effective governance effect, which in turn reduces firm audit pricing; this relationship i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firms with less effective board oversight and “non-big 10”.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non-CEO executive independence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receiving a standard unqualified opinion; and even if the audit pricing is reduced, the audit quality does not declin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clarifying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non-CEO executive independence, and have implications for listed companies to optimize their management structure and firms’ audit decisions.

Key Words: Non-CEO executives; corporate governance; audit pricing; audit risk; governance effect; supervision of board of directors